

我的母亲

曹珏



1938年在西南联大



1955年在清华大学



1958年在石油学院

我的母亲魏娱之出生在杭州一个世代书香的望族家庭。她的父亲魏伸吾早年留学日本习经济学，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担任过杭州铁路学堂校长，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魏伸吾一生娶过三个妻子（后两个都是续弦），共有6子7女，母亲是魏伸吾第三个妻子沈湘（结婚后改名：沈湘君）所生，在姊妹中排行第五，前面有2个哥哥，4个姐姐，后面有2个妹妹，4个弟弟。子女们关系都非常融洽。



1964年在石油学院



1986年离休

魏伸吾思想开明，富有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子女中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俗的造诣与贡献，如母亲的大哥魏景超为第一届清华留美公费生，后成为植物病虫害学知名教授；姐姐魏安之是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妹妹魏慎之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清华十一级）；弟弟魏任之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再小的

曹本熹夫人：魏嫒之（1916-1989）

两个弟弟魏一之、魏雪之在父亲因很早就不能工作，家庭无经济收入的情况下，也完成了清华夜大学的学业。

母亲 1916 年 5 月 7 日生于浙江杭州，幼年随父母搬迁北京，中学在北平女一中上学。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沦亡，母亲和许多女一中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母亲 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清华十级），1937 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学们分头向长沙集中。母亲带领妹妹魏慎之到长沙报到，1937 年 11 月 1 日临时大学正式开课，1938 年 2 月第一学期结束后，临大西迁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大，这一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北京。



1933 年女一中同学在北海



1936 年在清华大学

现代年轻人不同的是，他们先要了对方的照片，寒假回去征求父母意见，看到两个年轻人都那么才貌出众珠玉蕴辉，双方家长都很满意，这才有了后面浪漫美好的恋爱，他们相互爱得那样的真挚那样的深刻，在母亲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她说：

“我为你对我的赞美而汗颜。你无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不仅是在学习方面，性格也是最好的。我无法表达我喜欢你到什么程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喜欢你。在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种无名的精神，而且你把这种精神用你的眼睛温柔地表达出来……。我很羡慕和尊重你在学习、体育运动和工作方面的勤奋。我致以

我母亲和我父亲曹本熹是大学同班同学，初相识时他们都不到 20 岁。在朦胧含蓄的青春期他们互相倾慕，和



1937 年父母亲互赠留念的照片

曹本熹夫人：魏媿之（1916-1989）

对你幸福的最美好的祝愿……”清华园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和幸福，在课堂，在校园，在荷塘的月色下，他们的青春靓丽本身就是清华园的一道风景。



1936年清华十级同学在香山

1939年12月，又被聘回西南联大化学系做物理化学助教工作。母亲在云南大理喜洲教书，平常书信不断，互相关爱；假期母亲回昆明相聚。1941年5月10日他们在昆明正丰西餐厅举行婚礼。主婚人是双方的父亲曹湘涛（叶企孙代）、魏伸吾（因为当时身在成都，且已体弱多病，实际未能亲自出席）；清华校长梅贻琦作为证婚人出席了婚礼。婚礼简单而隆重。

虽然工作了，但在抗战的后方，我的父母亲生活也很清苦，同时他们还要为弟弟妹妹的成长分担一定的家庭责任。我的舅舅魏任之1939年考上西南联大航空系，家里已没有足够的财



1937年在西南联大合影

我的父母亲在西南联大完成了最后的课程，于1938年毕业。他们毕业后于1938年8月12日在云南昆明订婚，介绍人是朱亚杰、黄培熙。

父亲曹本熹大学毕业后，于1938年9月到从北平迁到昆明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做助理，进行用蓖麻子油制造润滑油的研究工



1938年西南联大毕业照

力供他上学，我的父母亲为他买计算尺、绘图仪器等专业学习用具，并提供部分生活费用，使他能够顺利读完大学。小舅魏雪之在成都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念初中时，母亲是他的数学老师，对他既是严师，又像是长辈，要求他学习、做事一定要严谨认真，为人不求虚名，使他一生受益。

曹本熹夫人：魏媿之（1916-1989）

结婚第二年我的姐姐曹瑛出生。这时正逢英国文化委员会来中国招收留学生。为了工业救国和学业上的提高，父母二人商量后决定克服困难，由母亲承担抚养孩子，父亲积极做好投考



1942年10月全家合影

投考的准备。该留学项目由英庚子赔款提供费用，共设10个专业在全国招考，每个专业仅录取一名。父亲报考了化工专业，经过努力终于被录取，进入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化工系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母亲于1943年12月带着女儿来到成都和母亲、弟妹一起生活，并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教高中化学和初中数学课。但是不到一个学期，因为她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引起光大附中学生中的部分纨绔子弟反对并且对她进行了人身攻击，而当时

光华大学的校长四川军阀向传仪对事件不作处理，母亲愤而辞职，转而去重庆，到兵工专科学校教书。

尽管当时国外的学术和生活环境比国内好很多，但父亲为了妻子、女儿，为了国家，1946年在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就回国到久别的母校——清华大学报到，父亲被聘为清华大学在北京复校时增设的化学工程系副教授、副主任。后因系主任张大煜教授未到职，1948年父亲被提升为教授、系主任。母亲也随父亲来到了清华，经历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他们终于又相聚在一起，从此相伴终生并肩奋斗，实践他们从年轻时就立下的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人生理想。

清华当时有一条规定：夫妇二人不能同在学校工作。但经陶葆楷先生等帮忙，采取变通办法，母亲被安排在土木系图书室工作，由水利部水工实验处与清华合作的水工试验所支付工资。新中国成立后，各系在发展中急需扩大教师队伍，学校的规定也有所松动。1950年母亲回化学系任教，作高崇熙教授的助手，指导本系定量分析实验。当时化学系教师中，除去教授，数她最年长，母亲学识精湛为人谦和，乐于帮助年轻的讲师、助教，所以大家都像称呼教授那样，尊称她为“魏先生”。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上实验课前，她要逐一复验学生们将要做的全部分析试样的定量数据，以便对照检查学生的实验结果，每个学生的试样都不同，因此工作量极大。她总是早来晚走，终日埋头在教师预备室。她的工作态度带动了新来的助教们，他们不但学习她的方法，更受到她的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的熏陶，这使他们感到终身受益。



1947年在清华大学

1953年初，在新中国大规模“院系调整”的洪流中，“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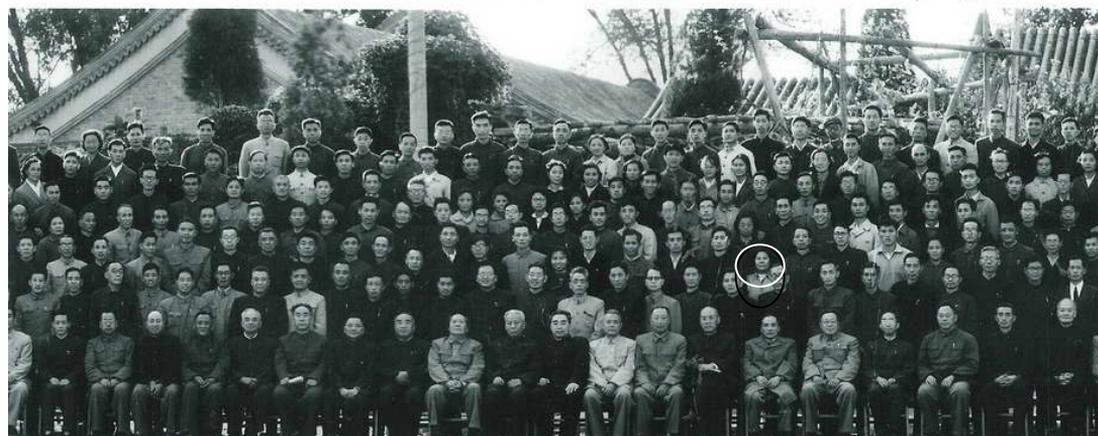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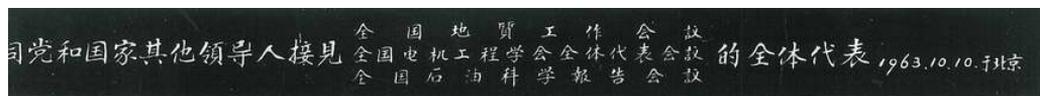
成立，父亲作为为筹委会委员兼筹备处副主任，专责全面教学筹备事宜；母亲也一起参与了北京石油学院建校。1954年初，北京石油学院建立校代会，母亲是委员之一。石油学院成立后，作为教务长、副院长的父亲和同事们对各系的专业设置、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师调配、教材选择、教学大纲、教学实验等精心筹划，各处系领导班子也逐步健全起来，教学工作正常有序、高质量地开展。母亲被任命为炼制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炼制系副系主任、副教授，一直在北京石油学院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1957年在石油无机教研室

在无机教研室，母亲治学严谨，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任。虽然她在无机化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教学经验丰富，但仍一丝不苟潜心备课，精益求精不断改进。在无机化学教研室中，母亲竭尽全力致力于师资队伍的建设。她甘为人梯，对中青年教师的言传身教，热情帮助，严格要求，为教研室培养了一批骨干教师，成为无机化学教研室的中坚力量。在教学中，她对学生严格要求、诲人不倦。她带领着教师们对教学和实验课进行改革，在教学方面，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在实验方面，将原有的部分实验课内容改为大型无机制备，使教学内容更密切结合专业，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使每个同学能够独立查文献，自己配仪器。单

独进行实验，培养了同学们了解和解决实际生产中问题的能力。这门课程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教学效果优异，教师们也受到同学们一致的欢迎和爱戴。她身体力行所树立起来的优良的教风，成为了无机化学教研室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无机化学教研组作为先进集



1963年母亲作为石油学院科研成果代表的一员，受到了中央领导在中南海的接见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体，母亲也作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北京市 1959 年群英会。作为石油炼制系副系主任，母亲还负责领导全系化学各基础课教研室的工作，她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调查研究，直接听取师生意见，认真检查教学效果，对化学基础课的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为石油炼制系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她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他们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卓著贡献中也有我母亲的一份心血。在“文化大革命”前，她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五好教师。1963 年作为石油学院科研成果代表的一员，出席了石油科学报告会，受到了中央领导在中南海的接见。

“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由于在重庆北碚的兵工专校教过书，以及她的妹妹魏慎之在台湾，而受到“造反派”关禁闭、隔离审查。母亲 1969 年 11 月随学校迁到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当时那里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她和同事们住干打垒土平房的集体宿舍，她那时已经 54 岁，膝关节长了骨刺，关节中还有游离骨，走路时一旦卡住疼痛难忍，一步也动弹不得。在当地缺医少药，极为困难的生活条件下，母亲一直坚持着工作，直到病退回到北京，以后于 1975 年 8 月正式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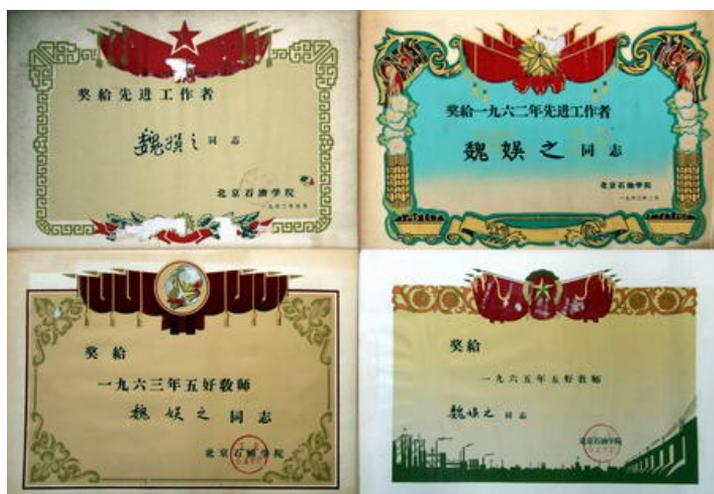
1985 年参加石油大学校庆活动

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教书育人、悉心传授，后又在街道担任小学生的校外辅导员，满腔热情地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和辅导，她的这种为培育后辈不遗余力的无私精神受到了社会的很高评价。

母亲于 1989 年 4 月初因长时间低烧不退住进复兴医院，这是她一生唯一一次生病住院，虽经医院各种检查，并请多家医院著名专家会诊，最终没有找到病因和诊治的好办法。母亲于 1989 年 6 月 26 日病逝。她把遗体捐献给了医院（她的遗体也经医院解剖查找

以后于 1975 年 8 月正式退休。

退休后，她不顾体弱多病，仍在教育事业上发挥余热。先受聘于



母亲在北京石油学院获得的奖状

法。母亲于 1989 年 6 月 26 日病逝。她把遗体捐献给了医院（她的遗体也经医院解剖查找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病因），复兴医院医务科于1989年10月组织了年度第二次全院临床病理讨论会，对母亲的病历进行讨论、研究。母亲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虽然母亲已离开我22年，但她和父亲相爱一生的往事，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待人处事和崇高品德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时时鼓舞着我，激励着我。父亲和母亲是我们子女永远的榜样。

相爱一生



1945年母亲寄给父亲的照片

家里留存着她们自1937年5月至1946年8月期间不在一起生活时的150多封来往信件，以及以后短期分开时的零散信件。母亲把它们装订成多册。用父亲信中讲的：“那些宝贵的信件至少大半都存着 Inspiration(灵感)的痕迹，我也愿它们永远留存着。当我们将来有空暇拿出来一同看时，一定会都感到无限的快乐。”

从大学时相爱一直到1983年父亲去世，在将近五十年的岁月中，他们的爱情始终那么甜蜜，他们互相关

爱，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互相依靠，从没有吵过架。父亲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的为人是宁愿自己受苦而不愿人家受苦。对你我更时常提过，我愿我代受你的一切苦痛，而不愿你受些微的罪。”他们真正做到了结婚誓词中所说的：“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生的伴侣！”



1983年在中山公园

父亲在英国三年，那时母亲的身体不好，一个人带女儿很辛苦，父亲的每一封来信都问起她们的健康，“有几种忧虑我是从不会除去的。主要的如你和瑛儿的营养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设法托人代买鸡蛋与肉等，千万不要因为省钱而不顾（这问题）”。在英国的三年，父亲的心始终眷念母亲，他们无时不刻地思念着对方，始终像热恋时一样。“只要是娱之做的事，没有一件我会感到不满意和抱怨，娱之在本熹的脑中，永是那么可爱，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1982年在临潼疗养时在华清池留影

她的笑容制服了整个的本熹。”“在人家面前，我是永夸奖自己的夫人，不但是满意，而是自傲。要是重游西湖的时候，在陶醉的爱情中，我对娱之仍是无限的尊敬。”他们每周都要写一至二封信，每信必回，让关爱跨越千山万水温暖对方。母亲1945年寄给父亲一张她和我姐姐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本熹：永远属于你的两个人，请把她们永远的深深的珍藏在你的心上。”

父亲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里挤出一些寄给母亲，“我在这里为着你们的生活，为着你们的健康，无时不在深虑，经济方面尽量节省，把多余的全部帮助你。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做一套整套比较正式的西服，需要穿稍正式衣服的场合时，我是穿从国内带来，以前在上海制的一套。虽然稍尽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因为国内币制的混乱，少数的汇款对你

毫无所补。可是，我对你的深爱或许也能稍表达万一。

在留学后期父亲更想念家人：“时间不可算不是飞速的过去，可是目前离我们重聚的日子还是很远。我现在急切地盼望这日子的来临，对我爱妻的想念更是日日加深。”

“我把一切快乐，一切幸福寄托在你和瑛儿身上。我是日夜的盼望着即刻回到你的跟前，让我来报答你这几年的辛苦；另外一方面，让我从家庭中求取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这个时期已在不远的将来，我也相信，你一定也愿意我这样做的。”

关于父母亲的感情，父亲有一段话总结得很到位，“我已证实和发现我们的爱情在结婚前是由隐藏而爆发，初恋的一段，是双方情感似万马奔腾的表现出来，然后渐渐滋长，在结婚后的初段，享受到蜜月的乐趣，好像是结了些果实，可是，这并不是最大的成功，这更是真正求情爱达最优境的开始。好像读毕了四年大学，走出校门才是真正事业的开始一样，这方面当然需要更大和更多的努力，本熹希望并坚信能以胜利的前进来求得娱之最大的芳心。”

后来在多年的工作中也常有出差等短暂的分离，他们仍习惯用书信表达相互的牵挂。



父亲去世后母亲精心制作的纪念相框

曹本熹夫人：魏焮之（1916-1989）

在母亲随学校迁到山东后，父亲时常邮寄或托人带去罐头，给条件艰苦的母亲增加营养；而相聚后，信上的关切就都变成了真真切切的实际行动。父亲安排母亲去西安做温泉疗养，治疗病腿；当父亲患糖尿病及后来患直肠癌，母亲每天想方设法按营养需要给父亲调配伙食，陪他去看病，一起去公园锻炼身体。在父亲的检查发现癌症已经转移的情况下，母亲想的是怎样减少父亲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陪他走完了最后的路程。

党外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母亲是旧社会过来人，但她的思想觉悟却是非常高，她是民盟盟员，也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认为她在重庆兵工专校教过书和有亲属在台湾而被拒之门外。但从她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拥护，她的思想政治觉悟看，我说她是“党外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她去世后，石油大学的讣告中写道：“魏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她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为发展我国的石油及石油化学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魏先生的一生，心地纯洁、胸怀坦荡，平易近人、诚恳真挚，不计名利、急公好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她生活俭朴，她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品德备受广大师生及社会的崇敬和爱戴。”

说起“无私奉献”，许多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64年全家在三里河

我姐姐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上大三时，去农村参加劳动，不慎磕到了腰，有一块红肿，去医院也没看出有什么大问题。一个多星期后突然发高烧，经多种检查后，确诊为白血病。父亲当时正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在西北忙碌，被领导紧急召回后，安排姐姐住院和治疗仅一个月就又去现场忙工作了。白血病的医疗费用很大，常需自费输血，局里

准备给他补助，他没有接受，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那时协和医院对白血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姐姐只能是住院——缓解——回家——再住院……。姐姐住院期间，医院提出希望能在姐姐去世后进行尸体解剖，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流泪同意了。生病后期，姐姐双目失明，排尿需要用导尿管，还不时输氧。父亲和母亲在家中给了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1965年9月，我的姐姐曹瑛去世。她生前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不仅功课好，政治上要求进步，而且是清华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和乐团的小提琴手。病魔夺去了女儿年轻的生命，作为父母亲他们十分悲恸伤心。母亲在邻居的帮助下，为姐姐洗身，换上了姐姐最喜欢的衣服；父

曹本熹夫人：魏嫫之（1916-1989）

亲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女儿的尸体送到协和医院，为了早日攻克白血病，为了医学科学研究，我的父母献出了女儿的遗体。

姐姐从小就随着母亲颠沛流离，父亲出国期间，姐姐既是母亲的小累赘，又是母亲的小助手，姐姐的去世给了母亲最沉重最持久的打击。她流干了泪，痛碎了心，几十年后提起神情仍是黯然：“家中四个人，总有一个先走，曹瑛抢在我们前面了……”她说“北京有些地方我是不忍再去的，为曹瑛找偏方走过的胡同，无数遍去医院走过的路等，多少年后想到心都会颤抖。”但同时她又是一位非常坚强的母亲，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用拼命的工作来缓解内心的痛苦，这使她原有的神经衰弱毛病越来越厉害，以致后来不得不休病假。除了吃药，她就是到公园，还一个人去北海公园划船，她的划船技术有了很大提高，病症也得到一定改善。但直到我父亲去世后她还说“虽然很悲痛，但总能想得开，两个人总有早走晚走的，但是女儿的离去，到现在也没有缓过来。”

父亲 1983 年 12 月去世后，母亲强忍悲痛，带领我们夫妻拟定了捐赠遗体的协议，并将家中不多的全部存款两万元捐给核工业部党组作为党费。她怕组织上不同意，特地向核工业部党组写了一封诚恳请求信，信中说：“我们国家目前不富裕，还发行国库券，我们这一点钱对国家的需要来说，那简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只不过是我们对国家的心意而已，至于我们的生活，儿子、媳妇有工资，我有退休金，……孩子们比较懂事，对老人能尽孝道。现在，我恳请党组织同意接受我们这笔钱作为本熹的最后一次党费吧，如果得到应允，这是我们全家莫大的幸福和荣幸……”核工业部党组同志都很感动，原党组副书记刘书林同志写道：“精神感人，堪为楷模。”



1984 年母亲向月坛街道捐款，用于老年人的福利事业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方面通过欣赏音乐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结合不少老年人在老伴去世后困难较多的情况，特别关心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和老年公寓的发展。在核工业部党组为使我们家生活宽裕一些，将二万元送回的情况下，母亲又将这些钱分别捐赠给了月坛街道办事处和中国老年基金会各一万元，用于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她在 1985 年至 1987 年多次获得过北京市和西城区有关部门的奖状，于 1986 年被聘为中国老年基金会的理事。

母亲去世后，她的遗体也根据她的愿望用于了医学研究。她和我父亲都是学习科学的，一生从事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最后也都按照科学的方式，完成了一生的轮回。在我

曹本熹夫人：魏嫫之（1916-1989）

父母的影响下，母亲的多位弟妹也做出或将要做出自己对社会最后的贡献。如我在台湾的六姨魏慎之就做了台大医院的“大体教授”（奉献躯体，供作解剖教学，造就无数良医），姨父也与台大医院签订了做“大体教授”的协议；我的七姨魏靖之的遗体被七姨父和子女献给了北京医学院；在南京的舅舅魏任之也加入了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协会，准备在去世后捐献遗体。

在日常生活中，母亲也有很多感人的事迹。她在清华工作时的同事郑用熙回忆起母亲去世半个多月前的一件往事：



1985年石油大学校庆和老同事们合影

表达意见，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年青人来日方长，不要绝食。要为国珍重。”她在病危时，仍念念不忘关怀青年，她这些热爱青年的赤诚话语，使我听后，不觉泪下。

她高烧两月，但病因迄未能确诊。五月底起，肾功能有些不正常，排尿困难，两腿肿。当我与曹珏简要商谈了有关请人会诊的事后，魏学长考虑到复兴医院离木樨地大桥不出百米，她对6月4日凌晨的密集枪声余悸犹存，立即催促我回校，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她的大姐风度，认真负责和热爱青年的崇高品德，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目中。

母亲在清华大学和石油学院工作中，她的平易近人、诚恳真挚深受教师们的好评。

陈鲁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于1972年患了癌症，回京住进北医三院，手术后多次化疗。在漫长的两年住院期间，魏先生不间断地来看我。她从三里河到北医三院路途不近，当时只有公交，况且她膝关节有病！后来得知曹先生患了糖尿病，她要照顾病人。我多次劝阻她不必来看我了，无效。有一次下雨，她竟然穿着高筒雨靴冒雨来医院看我！魏先生对我的诚挚友情震撼着我的心灵！

1974年我终于出院了，在北京东四借了一间小屋暂住养病及随诊。魏先生又在百忙中抽空与曹先生一起来寒舍探视。他们两位对我关心爱护的无价真情使我永生难忘！回忆起

我是在1989年6月2日才得知她发烧住院已两个月。我于6月5日下午，冒险骑车去复兴医院探望她。刚到这时，她因长期高烧，有些昏迷，起初不认得我了。不久她儿子曹珏来了，在她耳边大声（她有老年耳聋症）说：“郑用熙来看你了”，她再次睁开眼，就认出我来了。她知道我已回清华工作，认出我后的头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告诉青年学生，不要摧残自己的身体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这段往事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母亲退休（1986年改为离休）后，我们家成了石油学院一帮老太太（多数都是正副教授）们的聚会场所，每次聚会前二、三天，母亲就会草拟出菜单与我和我夫人商量，然后我们采买；当天，母亲亲自掌勺做她最拿手的菜肴，我夫人给她打下手。母亲在老太太们中间年龄最大，她们都和我母亲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多年后和我见面时，都对在我家的聚会念念不忘。



1986年石油大学的老太太们在我家聚会

母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时时体现出她高尚的觉悟。

改革开放以后，粮食虽然还是定量供应，但由于副食品的增多，粮票逐渐有了富余。那时，许多人拿粮票换鸡蛋、日用品。但母亲绝不允许我们用粮票去交换，每月的剩余粮票都拿到粮店存到存折上，为国家节约每一斤粮食。直到粮票取消时，我们家的存折上存了有2000多斤粮食。这个存折也成了我纪念这一段历史和母亲为人的收藏品。

有一次我的表妹从外地来北京玩，她是个中学生，为了想省乘公共汽车的钱，想向我夫人借月票使，被我母亲听到，连我们夫妇一起狠狠训了一顿。不能贪国家的便宜，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成了我们做人的准则。



1973年父母到青海锻造厂看我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三口人分在三个地方，母亲在山东，父亲在北京，我在青海，每年约好了时间请探亲假回北京团聚，父母的来信传递着对我的关心和关爱。1973年夏天母亲因腿病病退，正好父亲到兰州出差，她们就都来到了青海，我们全家在青海锻造厂团聚了四天。她们是青锻厂200多北京学生的父母同来青海看望孩子的第一对。

对孙子的教育，母亲从不溺爱，从小培养他“只要自己能做的，就要自己做”的能力。会走以后，母亲带他去木樨地河边或去玉渊潭公园玩时，从不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抱他。走累了就让他蹲下歇一会儿。二岁半就给他送幼儿园过集体生活。那时家里请了阿姨，每天接送孙子。母亲规定在从幼儿园回来的路上，绝对不许买冷饮。看着别的小朋友吃冰棍，孙子非常馋，但规定是不允许破的。家里冰箱存着有冰棍，只能回家以后吃。

面对折磨她的骨刺。母亲以极大的毅力，采用多种方法积极治疗：一方面采用食物和药物治疗，吃难以下咽的不放盐的蛇蜕炒鸡蛋，喝“骨刺消痛液”；另一方面采用按摩疗法，



1984年我们陪母亲和七姨去黄山旅游

由中医大夫给她按摩治疗。更多的是家里每天的“土法按摩”。我通过陪她去诊所，记住一些治疗的穴位，在家经常给她按摩腿部。而最常采用的，也是母亲感到效果最好的，是我和父亲用擀面杖给她擀腿。虽然方式原始，但我们好使劲，擀的力量也大。她的腿慢慢好起来。父亲去世后的1984年11月，我们全家和我七姨一起，去黄山旅游。一共玩了6天，那时没有缆车，我们每天上午走十几里山路，然后

住下来，下午就在周边玩和看景；第二天再往前走，母亲一直坚持下来。我的儿子那时才5岁多，旅游期间一次没抱过，完全自己走。母亲的严格要求，培养了我儿子独立克服困难的能力。

母亲不但在学术、教学上很有成就，而且有出众的艺术天分和浪漫气质。她多才多艺，兴趣爱好广泛。自小她就喜欢唱歌，嗓音好，晚年她特别喜欢“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唱得动情优美；她还喜欢听音乐，我给她买了一台夏普777收录机，就成了她最离不开的宝贝。她每周从中国广播电视报的节目预告中选取要收听的音乐节目，标出要录制的小提琴曲、钢琴曲和交响乐，然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收听和录音。她录了上百盘的磁带，音乐帮助她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还会弹吉他、会吹口琴，在文化革命只有样板戏可看的年代，抽屉里的口琴和小时候的歌给她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她的绘画技巧也不错，很多年前画过彩蛋，她绘制的彩蛋几乎可与职业艺人媲美，精美的彩蛋曾精心包装在铁罐里邮寄给父亲作为生日礼物。她从四姨那里借来线装本的《石头记》，让我把里面的几十幅插图拍下来，洗出照片，就成了她画彩蛋和后来当校外辅导员教学生们做美女头像的参考。晚年时她还转而研究诗词，其中特别喜欢李清照的词……。不管做什么她都投以真情激情，因此她才能做得持久，做得华美，做到极致。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母亲喜欢逛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和北海是她和我父亲最喜欢去的地方，而中山公园的藤萝架旁和唐花坞是她留影最多的地方。曾有老朋友回忆说她在南京时常常一人去玄武湖公园静静地待上一天，秋风落叶寻常景致，都能使她思绪翻飞心底感动；在北京，她引远道来的朋友去紫竹院公园看她平日在公园的轨迹，她对公园的一切都熟悉，都有深厚的感情，她告诉朋友哪里是她最喜欢坐的椅子，以及这张椅子有人坐时她又会以哪一张代替，她还指着蔷薇花丛告诉朋友哪一年哪一日有一对男女在这里殉情，感叹不已……



1962年在中山公园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在我的眼里，她的生命又是如此伟大，如此精彩。她拥有人世间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和爱情。她在自己为石油高等教育做出不凡成绩的同时，五十年如一日关爱和支持父亲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对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用一生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地奉献社会和无代价地忠于祖国，他们没有占过国家的任何“便宜”，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们的形象高大无比。



1939年母亲参加在昆明召开的第7届中国化学会年会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1947年母亲及弟妹们和我的外婆合影



1988年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合影

曹本熹夫人：魏娱之（1916-1989）



1988年参加纪念清华毕业50周年活动合影



1987年朱亚杰、杨岫云夫妇和朱成功、薛华夫妇来家看望

曹本熹夫人：魏娛之（1916-1989）



1986年母亲在家中